

中生代  
思想书系

#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黄克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黄克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黄克武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

ISBN 7-80225-031-5

I. —… II. 黄… III. 梁启超(1873~1929)—哲学  
思想—研究 IV. B25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466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7.25 字数:169 千

版次:2006 年 5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1.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墨子刻先生序

1982年秋天,黄克武先生第一次上我在台湾师范大学所开的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常常有密切的沟通与合作,而他一再地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的《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师大的硕士论文《〈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1985)、《〈镜花缘〉之幽默——清中叶中国幽默文学之分析》(载《汉学研究》,第9卷第1期,1991)、《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1991)和《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1988),而最近他又出版了这本专刊《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有时看到黄先生这些杰出的作品,我常幻想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其实学生有两种,一种没办法教,一种不需要教,而黄先生是归到第二类的。所以无论谁是他的老师,他都会找到自己的路。然而,我不否认因为黄先生与我兴趣投合,而在学术研究上有相当程度的交流与会通。我认为,谈历史至少有三个不能相互化约的角度,即是注意到事件(episode,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重要人物的传记(biography),与制度或思

想上的架构或模式(pattern,像宋明理学的构造或梁启超思想的脉络)。最理想的历史学家,会同时强调这三个方面,但是多数学者往往会偏到其中之一,而黄先生与我一样,特别喜欢研究上述中的第三项:历史的模式。

然而如何研究思想模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研究某种思想时,我们当然要知道它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唐君毅教授所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那样的书,即是一种评估性的研究或哲学性的分析。这类书虽然也描写思想的一些特点,但它最重要的目标,是以一种对真理或人生价值的认识,去评估该种思想,看它是否能发挥真理,或对真理有所误解。

这种评估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重要性,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一些没有价值的思想,历史学家也应该很详细地加以描写,而不应忽略。为什么?

第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希望了解所有人类生活之中重要的面向,并把握所有人类生活的构造,而在我们从事思想研究之时,如果某一观念或某一词汇常常出现,并在该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那么它就算是重要的。例如,宋明理学常常谈到“阴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几乎没有价值,但在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便不能抹煞这些说法,而专从“为己之学”的角度,来了解宋明理学。

第二,要决定某一观念有没有价值,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很多学者觉得“理性”与“道德”是很明显的东西,而用它们来评估历史性的观念,也是轻而易举的,然而“理不易明”,这样的工作,其实并不容易。比方说,黄先生在这本书中描写到20世纪初两种很不相同的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即是谭嗣同的转化性的看法与梁启超的调适性的观点。哪一种思想比较合理?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很多的研究与反省,才能慢慢地寻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人们并无法依赖一些很明显的

标准,来从事评估的工作。换言之,我们处于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复杂时代,因此需要将“评估标准”的问题挖掘出来,并以最系统的方法,来寻求解答。然而,这种工作必须以一个更根本的功夫为基础,即是将描写与评估这两个方面,尽可能地分开来。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能细致地描写历史人物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也能慎重地考虑这些思想特征到底具有何种价值。

黄先生的这本书并没有完全避免评估的问题,但是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描写方面。梁启超的思想博大精深、复杂多变,在近代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难怪在中西学术界,每一个年代的学者都对梁启超的思想有他们自己的看法。黄先生现在仍然继续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他以后将会提出更进一步的完整解释,然而,我相信,他这本书的结论完全可以立足。我不否认我觉得黄先生这个研究十分重要,我也相信我们愈了解梁氏调适思想的特征,就愈可以了解到此一思想所具有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其说是许多人艳称的五四运动,还不如说是梁氏的调适思想。梁启超和不少西洋学者一样,以为现代化不单纯是培养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过程,而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奋斗,即是把神圣的价值与物质的进步结合在一起。而且他和牟宗三教授一样,了解到此一糅合的过程是一条充满困难而崎岖复杂的“曲通”之路,人们不能在一瞬间直接地跳入一个“大公无私”理想境界。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以为,在历史的因果关系中,思想的因素并不重要,对此我不以为然。其实,无论是西洋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20世纪人类悲剧的渊源,常常和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取舍,有密切的关系。

1993年11月6日

## 许纪霖先生序

本书是台湾中国思想史学者黄克武先生的代表作,研究的主题是梁启超。梁任公思想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历久而弥新,如同欧洲的洛克、约翰·穆勒、卢梭这些古典思想家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如果要谈中国的现代性,谈中国的启蒙思想,梁任公是少数几个无法绕开的伟大智者。他留下的历史身影,笼罩着整个 20 世纪中国,他的思想已被公认为中国思想的经典。

我的专业是研究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过去我受到一个比较流行的观念的影响,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研究上很少接触晚清。之所以如此,如今检讨,乃是背后有一个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规模面向西方的开始,要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只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近十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几年,不少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学者,都将寻根的目光内转,从海外回到本土。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都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这一观察视野的大转换,意味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思想内在演变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

段。王德威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 20 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梁启超的思想,在这样的视野大转换里面,就显现出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梁任公的一生,精力过人,著作等身。在其上千万字的遗作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1902—1903 年间发表的《新民说》。克武的这部力作,正是以《新民说》为核心文本,研究梁任公的启蒙思想。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年轻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穿越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梁任公的《新民说》,我有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故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新民说》内中洋溢着各种思想的紧张: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利与义务、功利与义理、知识与德性、民权与国权、君子与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法律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现代中国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潮,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五四的思想家们在接受了梁任公的思想启蒙之后,各自循着其思想中的一条路径,走向偏锋,最终发生不可调和之分化。

令人惊讶的是,从梁启超思想出发的各种分道扬镳的思潮,比如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在梁任公那里,却得到了某种调和。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冲突,在《新民说》里面,却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对于这一现象,克武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解释: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乃是一种调适思想。所谓调适,来自于墨子刻先生的“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与“调适”

(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思想分析架构。简单地说,转化思想模式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突变的、跳跃的,要从黑暗的现实跨越到理想的未来,需要人的意志力和革命精神来促成这一转化。而调适思想则认为,新与旧之间没有截然区别的鸿沟,历史的发展是各种思想和历史合力的产物,是在传统脉络中渐进的、局部的改革。在晚清的启蒙者中,谭嗣同和梁启超分别是转化思想和调适思想的两位典范。

以转化思想作为参照,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成为本书的中心旨趣。梁任公的《新民说》之所以包罗新旧,有容为大,乃是其调适思想模式使然。李欧梵先生曾经说过,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最难,因为要背负“十字架”,既要熟悉西方文化,又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以我个人二十年的研究生涯,深刻感受到李先生道出了我们这一行的个中甘苦。晚清以来的思想,就是中西思想相交的那个“十字架”中点。要对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陈独秀、张君勱这些思想家有深入的探究,就不得不将他们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作比较,观察其横向移植过程中的观念蜕变——假如其中经过近代日本的过滤,则还要对东亚的思想脉络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还须将近代的思想放在中国自身的思想谱系中观其流变,寻找本土的文化传统。一般学者在上述某一脉络中有所心得,已属不易,遑论其他!

偏偏克武自觉地担负起学术的“十字架”,他对《新民说》的研究,正是放在中西两条思想脉络同时展开的。比如,关于《新民说》中个人与群体、自由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梁任公究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学界多有纷争,至今尚无定论。克武对此没有作化约主义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将梁任公的自由思想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作比较,同时又放在明代王学思想传统脉络之中加以理解。他同意萧公权先生的看法,认为梁氏思想中不少观念与约翰·穆勒十分类似,“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

下的个人主义者,但也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但又进一步指出,梁氏所强调的自由又是一个“非穆勒主义式的自由”(non-Mills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这种自由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显然,这种“非穆勒主义式的自由”只有放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才能获得其自身的意义。

在梁启超的论述中,究竟是以国家为本位,还是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们是传统社会中社群主义瓦解的历史产物。但在欧洲,个人主义既然是从社群主义中蜕变而来,在其早期就依然带有社群主义的历史痕迹。近代的个人主义受到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很大影响,都将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就像欧洲早期的情况那样,晚清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所接受和传播的都不是这种个人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而是受到社群主义影响的个人主义。这样的个人主义并不构成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相反地,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与近代的民族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二者之间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所具有的那种冲突和紧张关系,它们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同一个过程。在晚清,个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问题不在于是国家本位还是个人本位,而是所谓的“群己界限”,群体与个人在同一个共同体结构中究竟如何和谐互动。究竟是一个人重要,还是群体(国家)重要,二者何为本位,这一问题对于梁启超来说,并不存在。

在晚清,社群社会的文化传统依然对梁启超、严复这代人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群己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中国文化的群己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是伦理

本位或关系本位。中国哲学并不存在欧洲那样的根深蒂固的本体论和本位论传统。中国在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群体等关系上,不是像西方那样首先确定何为主体,何为客体,化约为某种本位意识。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颇有洞见地指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虽然法家和墨家比较偏向集体,道家比较偏向个人,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择中而处,即居于集体与个体的两极之间”(余英时语)。无论是天人,还是群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都处于积极的互动与和谐之中。在儒家文化传统里面,人是一个关系的存在,社会是由各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特殊主义的网络组成的。余英时在其名篇《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谈到,“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也就是说,个人是很重要的,但这一“个人”并非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权利主体,而是一个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这一主体对于群体而言又是非“主体性”的,他的道德价值必须人在人伦秩序之中才得以实现。狄百瑞(De Bary)把儒家的这种个人意识看作是有别于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一种特殊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

儒家的这些关于个人与群体的思想传统无疑给予梁启超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虽然反省了中国文化中只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缺乏个人与团体的公共关系,但他在建构新型的群己关系时,依然继承了中国思想中的社群主义传统。你可以说他是集体主义者,但他并不把国家放在目的论的本位意义上,他重视的始终是不压抑个体自主性的群体。你也可以说他是个人主义者,但他又从来不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者。梁启超的个人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叫做“尽性主义”。这一“尽性主义”,显然是从儒家的“人格主义”发展而来,但个中

的内容已经不限于道德之性,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人之个性,具有自然人性 and 道德人性的广泛内涵。

继承社群主义的思想,梁启超总是把个人和群体放在一个互动的脉络里面加以讨论。在他看来,像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法制)、利己与爱他等,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补的,他引用《中庸》的话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现代“合群”的国民共同体中,群己之间并不是目的和手段这样的工具理性关系,而是处于互动的辩证和谐状态。他所希望的是“有合群之独立”、“有制裁之自由”和“有爱他之利己”的中国式合一境界。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梁启超,就是在这样的互动辩证关系中理解个人与群体、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互动观念。这也就是梁任公不选择“转化”而坚持“调适”的方法论理由。

我认识克武已有十多年,作为同龄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我对他的研究充满了由衷的敬意,每每从他的成果中获得意外的启迪。在克武身上我常常感受到台湾学者那种既具国际视野,又有国学根基的深厚素质。作为思想史学者,背负“十字架”的另一重含义,乃是须兼有史学家的严谨与思想家的宽阔。克武恰恰同时具有这两种气质。这次新星出版社出版海峡两岸三地的中生代学者文丛,主持者慧眼收入克武的这部十多年前的经典“旧作”。克武给我写信,嘱我为大陆版写一个序。再三推却未果,恭敬不如从命,遂草成以上不成文的感想,以答谢克武之厚爱。

2006年3月于沪西丽娃河畔

## 自序

梁启超是一位复杂多变的思想家,自民初以来,中、外文之中有关梁氏思想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本书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企图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梁启超在清末的思想变迁及其意义。《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必读的一篇作品,因此该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新民说》所讨论的主要课题和梁氏对这些课题所提出的回答,都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这本专书的出版对笔者来说一方面是一个结束,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了过去多年来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习与摸索的一点点心得,希望提出来与师友们共享。但就整体的研究计划来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本研究所希望探索的根本问题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思想界的整体状况,或者说当时思想的光谱(intellectual spectrum),而梁氏的思想只是其中一端而已。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例如严复的思想内涵及其在此光谱上的角色、《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甚至此一思想光谱与19世纪初叶以来传统经世思想的关系等,都有待澄清。

这本专刊的前身是笔者于1992与199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

学与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 与康无为 (Harold Kahn) 两位教授所写的两篇学期报告,原是以英文写成,只具论文的形式与规模,后来以中文改写,逐步修改、增添,而变成这样一个有十余万字的专著稿。在此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这几年的细心教导,以及梅尔清 (Tobie Meyer - Fong)、姜进、秦玲子等同学的砥砺,没有斯坦福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环境,这本专著是写不出来的。文成之后又经张朋园先生与张灏先生及一位不知名的审查者看过,提出一些批评与谬赞。两位张先生是当今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祭酒,能拨冗校阅是我最大的荣幸。

张灏先生对作者所提出梁氏思想的三个特点有不同的意见,他肯定梁氏思想与传统的密切关系,对梁氏的幽暗意识有所保留,对我所说的梁氏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以及卷首所引萧公权先生的话则不表赞同。张灏先生认为梁氏受传统影响,他对群己的看法采取“人格主义”(personalism),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没有个人至上的观念,尤其在清末之时,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所以张灏先生认为梁氏所重视的仍是群体,他有很强的个人要为群体牺牲的观念。这些地方有待读者的判断。

这本专著的出版最应感谢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教授,与墨先生的一段因缘是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幸运的一件事。1982—1983 年墨先生于台湾师大课座,我上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明清制度史”的课,1984—1985 年他与李国祁先生又指导我以鸦片战争前夕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为题撰写硕士论文。他对学问的执著、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对台湾经验的肯定,以及对海峡两岸未来走向的关怀,不但使人景仰,也令人感动。我这些年来所写的东西都与他反复讨论,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在完成中文的初稿之后,来来回回请墨先生为我改了不下十余次,他缜密的思考与严厉的批判,使我渐渐养成不敢乱下妄语的习惯。他常说这种治史的态度

度,是学自他的老师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当然墨先生治中国思想史有他自己的心得,他不但一字一句地研读中国古典文献,更以一套自创的分析架构,来重建思想家思考的过程(thinking)。这本专著如果有一些贡献的话,和这套新的方法论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愿意将这本书献给墨子刻先生。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承蒙魏秀梅女士、许淑玲女士以及本所同仁的多方协助,谨致谢忱。最后要感谢父母和家人对我的照顾与支持。

黄克武序于南港  
1993年7月24日

## 再版说明

本书于1994年2月出版之后,转眼之间已超过十年,该书早已售罄,然因诸事繁忙,无暇修改。最近才完成再版修订与出版简体字本的工作。此次修订,除了改正错字、润饰文字之外,笔者也增加了一部分内容,补充说明学界中新的研究成果,但全文的结构、观点仍维持原貌,敬请方家指正。

又好友许纪霖兄在百忙之中惠赐序文,使本书增光,敬表谢忱。

黄克武

2005年11月21日

## 萧公权语

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櫫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他反对“民之父母”的政治观。民权的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一个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无微不至,纵然使得人人丰衣足食,但因为他阻碍了个人自动自发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 S. Mill),无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 J. 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如果上述的观察尚无大误,那么任公之与革命运动终归分离似乎还有思想上的因素。

萧公权:《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